

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国体育与政治关系探析

王震¹, 侯颖²

(1. 陕西科技大学 体育部, 西安 710021; 2. 陕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 民族国家意识是中国现代体育民族性生发的根源和基点, 体育的民族性与体育的政治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是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 而政治发展所维护的民族国家利益的事实则进一步加强了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当代中国政治与体育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 民族国家意识; 体育; 政治; 国民教育; 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2)02-0051-03

在当下中国探讨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 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指导下体育发展的民族性。这是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代中国实现自我变革与发展的理论思向(Directional Idea)之后, 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在国家层面的一种主动建构。因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推动下, 民族国家意识显然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点。本文正是从这一理论视阈出发, 探析当代中国体育与政治的内在逻辑关系, 也借此抛砖引玉, 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民族国家意识与近代以来中国体育民族性的形成

民族国家意识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 也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前提。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产生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紧密联系, 而欧洲各民族国家于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 则从法律条约上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其后,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 民族主义开始与殖民主义相联系, 如法国、荷兰和瑞典欧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 既是经济、军事强盛的结果, 又是民族国家身份获得的象征。与此同时, 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相继获得了这种民族独立国家的身份。^[1] 当时西欧形成的这类独立民族国家, 大多指“主权国家”, 表现为民族与国家同一或国民与民族合体的形态, 因而又被称为“民族国家”, 体现为一种“市民的民族模式”(civil model of nation) 或“国民的民族模式”(a people model of nation)。这些“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以基督徒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名义肆无忌惮地带着对自己以外的民族或国家的厌恶与蔑视向世界宣战, 用大炮说话, 强迫许多文明古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民族主义中的扩张主义最初的外在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民族主义内含的进步“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自治运动”, 则是对民族主义中反动的排外主义、扩张主义进行反抗斗争的结果, “正义战胜邪恶”为人类社会的法理, 因而各国独立运动取得“节节胜利”自然合天意, 符法理, 顺

民心。^[2]

但是, 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社会、历史语境下, 其意义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来, 民族是“想象”出来的, 而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也认为民族是一种“创造”,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民族并不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本质, 不具有可实证的、亘古不变的客观事实。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播》一书中谈到不同的民族以及形成原因: 以殖民地住民为依据的早期美洲民族主义、以语言为依据的欧洲民族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反帝为宗旨的亚非民族主义。这些依据和原因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往往与权力密切相关起来, 权力的掌控者可据此建立起一种完整的民族话语及对其的历史叙事。但无论如何, 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国家主义, 是以围绕国家主权而产生的特殊的精神力量。这在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国家表现得尤为充分和明显。

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于鸦片战争时期, 而民族国家话语则肇端于洋务运动时期。在历史上尽管中国也多次受到过外族的入侵, 但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 所存在的民族意识最多也就是大汉族主义, 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但是, 鸦片战争后所激起的一种中华民族的群体“救亡”意识则是民族国家意识所特有的一种品质。如安德森所言“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对旧制社会具有破坏性的力量。”^[3] 无论是统治阶级, 还是被统治阶级, 无论是维护旧制度, 还是创建新国家, 着眼于中华民族而不是哪一个单一民族的利益, 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从这一点出发, 追溯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意识对近代以来中国的体育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在洋务运动时期, 早期的军事体操训练一方面接受西洋的训练方法, 另一方面则采用中国自身的管理方法, 而接受西洋军事技术的根本目的则是达

基金项目: 陕西科技大学博士创新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体育与政治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震(1970-), 男, 陕西高陵人, 陕西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文化; 侯颖(1987-), 女, 郑州人, 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

到国家“自强”，即重新恢复中国在世界的强国地位，而至于体育对个人的发展是否重要，则从来未予以探讨。^[4]其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激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论述体育的重要性时，无一不是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角度来探讨的。陈独秀有感于日本靠军国主义教育而崛起的事实而赋予“兽性主义”体育教育以重要意义。“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仰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乖真，不饰伪自文也。”“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得兽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余每见吾国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5]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6]其所阐发的“野蛮其体魄”是对陈独秀“兽性主义”的具体发挥。由于长期背负“东亚病夫”的屈辱包袱，中国的现代体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民族振兴这一根本，尤其是在大型国际赛事中，通常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状态作为证明本民族的重要标志。这就使得中国现代体育与民族性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更倾向于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

二、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与政治之间的逻辑互动

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构成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而政治发展所维护的民族国家利益的事实则进一步加强了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

1. 中国体育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是由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造成的。中国体育与西方体育在形成的早期便由于各自的文化理念差异而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分野。中国古代哲学观讲“天人合一”，认为宇宙、自然界、人都是由“气”构成的一体，而西方哲学讲天人相对、天人有别；中国人乐长生、重节制、讲中庸，西方人求价值、谋进取、趋极端；中国人重直观感受、求整体把握，西方人重知行分析、细剖层究；中国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辨；中国人知足常乐、守成务实，西方人冒险创新、放荡不羁。^[7]中国古代文化是追求静态美的文化，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动态文化。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体育思想和体育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人格化”与“人体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养生化”与“健身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伦理化”与“竞技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单一化”与“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差异。由此也彰显了中西体育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中国体育文化进入近代以后，主要受西方国家的野蛮入侵及其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扭曲和嬗变，中国的传统体育观在整个世界体育体系中处于一种附着和边缘的地位。而这一改变的结果，尤其是山河破碎、国家危亡日益严重的现实，反倒是从正面激起了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主义者，都把发展民族体育看作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经过数代中国人的积淀已经化育为一种情结或心理。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中国学者

往往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二分法来对中国和西方的体育作出评判。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

2. 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发展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在任何国家，民族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无论是政治还是体育，都必须为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服务，但同时不得损害和侵犯他国和他民族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在冷战时期，由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冲突直接反映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体育方面，中国受外交政策的影响很大，坚决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一边，抵制或不参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的各种体育赛事活动；但对民间性的、有利于增进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和平友谊的体育活动，中国政府则大力给予支持。冷战结束后，体育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但在体育交流和发展方面，仍然受制于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例如，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凡是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政府一定会在体育方面有所反应。体育的这种国家民族意识和政治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整体利益主导影响的结果。

当然，体育的国家民族意识与政治发展的内在一致性问题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几乎历届奥运会的申办都牵涉到政治性因素。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体育在强调民族国家意识的同时，绝不能超越民族主义而走向极端的种族主义。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就是在希特勒纳粹主义阴影笼罩下而举行的一次极端不公正的体育赛事，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展示种族制度的优劣，借以激起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主义狂热，煽动全民族的复仇情绪，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舆论准备。中国体育的民族国家意识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不是相反，更不是借以进行殖民主义的扩张。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自古就有和为贵、亲仁善邻的传统，始终信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理念；从现实来看，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主张对内构建和谐世界，对外建设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体育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3. 民族整体利益是中国体育与政治联结的纽带。当代中国的体育发展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统属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彼此促进、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的体育发展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体育事业一直处在世界体育事业发展的边缘，几乎得不到世界体育界的承认和尊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政局不稳，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治力量来凝聚民族精神，以至于无法构建自己的体育话语，这才是导致中国体育发展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因此，新中国建立后，着重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视野和立场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体育发展格局，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成为中国政府发展体育的一项核心内容。而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发展也需要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

多方面的合力共筑。在外交领域,体育作为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中国历届政府所重视。在中美建交、中日建交和中欧诸国的建交过程中,中国就充分利用体育无国界的这一特点先期展开了体育外交,正是通过此种方式打开了与以上各国的外交通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把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形象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理念推向世界,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尊重和理解。当下,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和科学发展观,逐渐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中国的诸多文化元素也被世界体育所接受和采纳。这本身就说明,政治与体育只要结合的得体适当,只要在民族国家的合理范畴之内,在全球化时代是可以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认可的。

三、当代中国政治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及其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在于建设一个强大、稳定、民主的政权。而推动这一政权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体人民。受历史上“矮化民族”或“弱等民族”的历史语境的影响,捍卫民族尊严,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心理需要,也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亟需的现实证明。因而,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方面,中国都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指导这一发展的基本理论思维和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指导下,中国的体育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主体部分之一受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育的指导思想受制于国民教育的总体指导思想。体育是构建一个民族基本单元的必要手段,1999年《深化教育改革全面促进素质教育规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而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指导思想上当然要与国民教育的整体目标相统一。在2010年初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强调要以“健康第一”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指导思想。但是,我们绝不能教条地理解“健康第一”,单纯地从身体层面发展体育——在体育发展实践中,健康是一个全面性的概念,需要身体、知识、意志等多方面的共同建构。因此,体育应当对本身在整体教育当中的地位和任务加以明确,在国民教育的整体指导思想所指示的方向上展开。

第二,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是衡量运动员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国际性的竞技型体育赛事中往往蕴含着一定的政治色彩,某种意义上说,体育竞技也成为民族间竞争的一种表现。因此,运动员对待体育赛事的态度中也往往贯穿着他的政治觉悟,毕竟运动员参赛时是代表着国家,以服务国家和本国人民为准则。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竞赛宗旨,也内在地涵盖了对运动员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甄别。因而,在甄选运动员的过程中,参赛国对本国运动员的政治性加以考察是很有必要

的。在我国,“德才兼备”是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对运动员的选拔和使用也不例外。没有良好的政治素养与道德品质,即使运动员的体育竞技水平再高,一旦代表国家参赛,也极有可能在国际上辱没国家声誉。

第三,国家和政府行为主导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并不是单一孤立的事件,体育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必然产生交互性,因而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处于国家和政府的引导之下进行。如果体育事业尤其是公共体育事业的发展缺乏总体规划,有可能导致多方面的问题,如商业体育和公共体育之间的失衡、体育产业的失范引起经济生活紊乱、体育商业化之后因利益驱动而产生的流弊等,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第四,体育是中国政府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曾多次成为中国政府有效使用的外交途径,从“乒乓外交”到“女排精神”,再到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体育作为一个特殊的交流方式往往能够起到超出预想的作用。而在政府推动之下,中外的民间人士也可以以体育为平台进行有效的交流,这对于促进对外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第五,走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中国整体都在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上前进的同时,我们国家的一切事业都必然有着鲜明的与众不同的印记,而走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从其历史来看也将成为中国在将来必须加以坚持的一条基本准则。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体育事业都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体育需求也紧跟社会的需求,因此,当前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小康社会等理念相契合,实现体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为构建和谐社会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梅雪芹.世界近代史资料汇编[G].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72.
- [2]黄现璠.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四)[J].广西社会科学,2008,(4).
- [3][美]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9.
- [4]吴永.晚清洋务派政治思想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2007:89.
- [5]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74-175.
-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M]//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64.
- [7]杨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84-185.

[责任编辑:黎峰]